

出人、出书、走正路: 陈云与评弹艺术关系探微

金 坡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新中国评弹艺术的健康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离开过陈云的悉心指导。出人、出书、走正路是陈云在长期调查研究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与评弹艺术实际情况相融合的结晶。这一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的总体要求,对整个文艺工作都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陈云; 评弹艺术; 出人; 出书; 走正路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4)02-0117-06

Cultivating People Publishing Books and Keeping on the Correct Approaches: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N Yun and Pingtan Art

JIN Po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Pingtan has experienced a sound development for a long time under the devoted guidance of CHEN Yun since 1949. Cultivating people, publishing books and keeping on the correct approaches are the fruit harvested by CHEN Yun, who based on a long-tim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combines the Marx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ideas, the policy about literature and art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actual situation about Pingtan. This idea ha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Marxist literary and art thoughts, becoming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to preserve and develop Pingtan. Accordingly, it has a universal significance to guide the work in the literary and art field.

Key words: CHEN Yun; Pingtan art; cultivating people; publishing books; keeping on the correct approaches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1] 1905 年 6 月 13 日,陈云同志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练塘镇,青浦是评弹艺术传播的核心区域之一,受此影响陈云同志“从很小就喜欢听评弹”^{[2] (P17)}。从 12 岁听“戥壁书”^①开始听评弹是伴随陈云终生的业余爱好,1995 年 4 月 9 日,即其病逝前一日,他还在病榻上听了上海评弹团创作的中篇评弹《一往情深》录音带。^{[3] (P1837)} 1957 年以后,陈云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听评弹、研究评弹艺术,广泛接触评弹艺人,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对评弹艺术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从评弹艺术的角度形成了自己最核心的文艺观,在一些重要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4] (P759)}。1981 年 4 月 5 日,陈云在上海同上海人民评弹团团长吴宗锡谈话,提出“出人、出

① “戥壁书”是过去流行在听众中的俗语,在书场听白书,一般站在墙边,将身靠在墙上听书,所以叫听“戥壁书”。

收稿日期: 2013-03-21

基金项目: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项目“陈云生平思想研究”(编号: CYKT201315)

作者简介: 金 坡(1985-),男,山东泰安人,回族,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

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的总体要求,这一要求对于评弹艺人的培养、评弹书目的创作以及评弹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道路。自这以来,陈云的主张“一直对评弹艺术、曲艺乃至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4] (P760)}

一、陈云与评弹艺人关系

陈云与评弹艺术的关系首先体现在他与评弹艺人的密切关系上面。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评弹界流传着大量陈云与评弹艺人交往的故事,很多评弹演员对于他的关怀和帮助感激涕零。陈云是评弹界所熟悉的老听客,对于评弹以及评弹艺人,他持有较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评弹不仅仅能娱乐听众而且能够起到治病与教化的作用;评弹艺人不仅仅是说书先生而是医生和教师。陈云曾深情地对评弹界人士讲“你们都是大夫和先生,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教会听众很多知识。我的姐姐大字不识一个,可她说起《三国》、《水浒》来头头是道。她的知识哪里来的?还不是你们这些先生教的!”^{[3] (P1327)}绝不仅仅是口头上讲,陈云更是拜上海评弹团评弹演员朱介生、周云瑞为师学习琵琶弹奏。周云瑞往来北京以及苏州等地为他授艺的费用亦全部由陈云自己负担,“来苏州的来往车费都由我支付,到苏州后食宿亦由我负担。”^{[2] (P96)}陈云独自承担费用这一点亦得到周云瑞哲嗣周震华确认。^{[5] (P232)}除了把说书艺人当做大夫和先生看待外,陈云是真诚的把评弹艺人作为朋友对待的。陈云同志多次同吴宗锡等同志座谈,他每次都会问及评弹艺人的身体、工作以及生活等情况。1990年4月22日,陈云在同吴宗锡等人谈话时指出“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能够交一点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知心朋友,多听到些真话,是很有好处的。”^{[2] (P145)}对于评弹圈里的朋友,陈云是饱含感情的。六十年代初,评弹艺术面临推陈出新的形式,受政策影响很多老艺人或主动或不自愿地去说新书,其实他们很难在短时期内说好新书,得知这种情况后,陈云于1961年2月14日在北京同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对于这些年纪大的艺人“可以不要勉强,让他们说传统书好了。”^{[2] (P27)}

虽然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是陈云始终真诚而又平等地与评弹艺人交往。1960年春,苏州评弹团副团长颜仁翰以及评弹老演员徐云志、周玉泉应约拜见陈云,刚一落座,陈云就从卧室中走来同他们一一握手,还敬他们香烟;中午留他们吃饭四菜一汤,饭后于若木同志还亲自为他们每人削了一个苹果。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受此殊遇徐、周两位老艺人感动的热泪盈眶,说“封建社会王周士御前弹唱也没有这样高的待遇”。^{[6] (P151)}不仅仅是关注艺人的生活,陈云同志还关心演员的身体状况。1978年夏天,评弹演员徐丽仙因舌底癌在北京治疗,得知这一情况后,陈云同志与文化部华君武等同志冒着酷暑亲临探望。

与评弹演员杨振雄的交往可以算作陈云与评弹演员交往的典型事例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杨振雄随上海人民评弹团赴北京演出,在文化部礼堂为陈云演出了《嬉梅》。演出结束后陈云跟杨讲“今天听了一回难得听到的好书”,当时茅盾、夏衍等领导也对杨讲“应该坚持说好这种文化品位高的书”。后来杨振雄在杭州说《描金凤》达一月之久,当时陈云在杭州休养,他每场必到,剪书之后还请杨氏兄弟吃饭。陈云很喜欢杨振雄的《西厢记》,1986年电台播出杨单档演出的八十一回《西厢记》,他一回不漏的挤时间听完了八十一回的录音,听完录音后,陈云题词给上海广播电台称赞该书“极好”。^[7]

20世纪60年代杨振雄曾画了一个扇面送给陈云,为了回情也为了奖励,陈云在1988年1月书写两首唐诗送给杨,一幅为张继的《枫桥夜泊》、一幅为李白的《峨眉山月歌》。杨振雄拿到条幅以后写了一封感谢信给陈云,同时请他为上海评弹团办的书场“乡音书苑”题名,陈云题了字后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何占春交给当时的上海评弹团团长兼乡音书苑经理王济生。^{[8] (P8)}1991年杨振雄患脑溢血被送进上海市第六医院,陈云得知后指示医院全力抢救;后来,杨住进虹桥疗养院,陈云还委托吴宗锡带水果来探望,并且传言要杨“保重身体”。^{[9] (P8)}陈云非但对待评弹艺人如朋友,而且给予评弹艺人特殊待遇,他晚年经常书赠条幅给艺人,得到他手书条幅的艺人即有杨振雄、秦纪文、金声伯和吴子安等十余位之多。另外,陈云很少与别人留影,但是他却经常同评弹圈内朋友合影留念。^{[5] (P232)}

陈云所讲的出人就是要热心积极培养年轻优秀的创作人员和演员,使青年评弹演员尽快跟上甚至超过老艺人。陈云认为出人不一定要求一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人就很好,艺术需要艺人集中心力去钻,勤奋才能出人才。^{[2] (P125)}青年演员侯莉君在“蒋调”基础上吸收“俞调”及京剧旦角唱腔并根据

自己的嗓音条件创造了“侯调”,起初评弹界里质疑声很多,陈云知道后明确地讲“唱腔允许各有风格,但要保持评弹特点。侯莉君的唱腔,我不反对”。^{[10] (P13)}对于青年演员,陈云总是鼓励与支持。对于传统艺人,陈云亦是抱着同情与理解的态度进行关爱与帮助,他非常理解传统艺人转变的困难,“旧艺人与传统书一样都是旧社会的产物,很难在一夜之间发生根本转变”。^{[5] (P235)}为了更好的保存与传承评弹艺术以及培养评弹艺人,1962年陈云建议成立苏州评弹学校。著名评弹演员蒋月泉、严雪亭、周云瑞、杨振雄、唐耿良和曹汉昌等分别到该校授课,该校为培养评弹专业人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出人,为评弹界老艺人的改造以及新艺人的培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评弹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保存了力量。陈云与评弹艺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他从不要求把他对评弹艺术发表的意见,当做“指示”,当成结论性的意见,要求别人执行。

二、关注书目的整旧与创新

陈云与评弹艺术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对于评弹书目整旧与创新的关注。书目是对评弹脚本或演出节目的称谓,^{[11] (P25)}陈云对评弹的新书和老书以及书目的革新与创作有自己的看法,1959年11月,他在杭州同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太成、吴宗锡等谈话时即将评弹书目分为三类。^①这种分法后来被评弹界普遍接受并运用,成为评弹研究中约定俗成的书目分类法。陈云同志所讲的出书就是要一手整理传统书目,一手编写反映新时代、新社会、新事物的书目,特别是要多写多编新书,侧重点是评弹书目的整旧与创新。

传统书目大都产生于封建时代,数百年来长期在民间流传,内容中不可避免的掺杂了反动、迷信、黄色等成分,对于传统书目陈云并没有全部否定,“传统书不少是好的……老书是经过了多少代艺人精心锤炼的”。1961年9月陈云在同上海人民评弹团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戏曲组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衡量一个节目的好坏要看对人民是否有利。传统书目不可能一下子都整理好,陈云认为对于传统书目精华与糟粕共存的情况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逐步整理,“对疑难问题可以用争辩方式取得一致意见。这也是走群众路线。当意见不一致时,可以保留意见,不搞强迫命令”。^{[2] (P18)}同时他还提出了整理旧书的具体工作步骤与方法安排“整旧工作可以分作两步走。首先,把最突出的坏的地方删掉;然后,逐回整理,或者整理成几个中篇,或者整理成分回的形式”。^{[10] (P3)}1960年1月20日,陈云书写了一份《对整理传统评弹书目的意见》,委托评弹演员徐丽仙转交吴宗锡,在这份意见书中提出整理传统书目的八条意见,其中明确提出“防止反历史主义的错误”,针对传统书目中很多违背历史史实的情况提出相应解决措施。

陈云认为应该以防止反历史主义的态度以及科学的精神对待传统书的书情。评弹老艺人杨斌奎说《描金凤》时讲到从苏州坐船到朱仙镇这条水路时,陈云对明代时是否有这样一条水路持怀疑态度。后来,他特意请中国历史研究所的同志考察是否有这样一条水路,经过考察确认这条水路在隋朝时已经开通,明朝时仍是通船的。陈云认为这样祛疑的考证是有益的,他同时还把历史研究所的来件打印了数份分发吴宗锡、杨斌奎等人。^{[10] (P25)}

陈云多次讲到评弹演员应当学习文化,熟悉历史、地理知识。1960年3月,陈云在杭州大华饭店新大厅连续听评话演员汪雄飞的《过五关斩六将》,在与汪进行交流时陈云提到从许昌出五关、渡黄河到冀州这条路线,有些地方说错了,有些地方则没有说清楚。因此陈建议汪“要说好《三国》这部文学名著,应该学点地理知识,不妨到学校里请教老师”。^{[2] (P21)}《隋唐》这部书是说隋末农民起义的,陈云在同演员吴子安谈话时讲到“要用新的历史观点来说……要讲人民群众的力量。说演义书,要懂一点军事常识,夸大不要过分”。^{[2] (P21)}为了方便评弹演员对于书中历史和地理知识进行核查,陈云将一册《简明中国通史》、一本《中国分省地图》、一部《辞源》送给了上海人民评弹团,其中后两本书是他用过的旧本子。

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传统书目的整理工作。在其亲自指导下很多传统书目的改编修订工作取得重要成就。《双珠凤》、《珍珠塔》等传统书目的整旧工作体现了陈云同志的评弹观。陈云曾多次观看徐丽仙、张维桢、朱介生演出的传统长篇弹词《双珠凤》,1960年1月20日陈与徐

① 一类书,即传统书,也称老书;二类书,这是解放初期部分艺人发起“斩尾巴”以后产生的;三类书,指现代题材的新书。

丽仙等探讨关于《双珠凤》的改编问题。在了解了哪些是已经把传统说法改过的新的说法以后,他提出了整理意见。后来,陈云又写信给吴宗锡赞扬了《双珠凤》的整理工作,“徐丽仙等说唱36个小时的《双珠凤》是好的,每部旧书如能都有这样一部粗糙的但是有益的整理,则就可以说是一种成功”^{[2][P19]}

传统长篇弹词《珍珠塔》讲述明河南秀才方卿因家贫而遭姑妈奚落,其中状元后假扮道士唱道情羞讽其姑,最后与其表姐完婚的故事。该书是传统书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当时评弹圈里很多人认为该书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因此不能改。对于该书的思想内容有两种主要看法,一种认为该书以反势力为主,具有积极意义;另一种认为该书在反势力的外罩下,宣扬封建意识、封建伦理道德和功名利禄思想。^{[11][P83]}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周良认为该书“对势力观念的批判,并没有掌握新的思想武器,仍然是站在封建的立场,用封建的思想进行批判的,因而这种批判是不够有力的。”^{[12][P166]}吴宗锡(左絃)认为该书是一部充满了封建意识,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和功名利禄思想的书目,是一部公式化、概念化的封建主义说教书。^{[13][P117-149]}陈云不同意这部书“不能碰”的说法,他认为《珍珠塔》一定要整理好,“解放已经十年了,如果再过十年,还是那样的《珍珠塔》我们是不光彩的”。

对于《珍珠塔》的整旧工作陈云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1960年2月18日到3月2日,薛筱卿在杭州唱了14天《珍珠塔》夜场。3月1日,陈云同薛筱卿谈话,初步提出了对该书的整改意见,他认为“《珍珠塔》宣扬封建道德的地方很多,需要改,但不要去掉其中的功名思想。”^{[2][P20]}评弹演员赵开生则认为“要改革《珍珠塔》,对人物处理要下一定功夫,还他们本来面目,使人可信、同情,听众才会关心。”^{[14][P96]}当年5月16日,陈云在杭州同周良谈话,了解了评弹圈里对《珍珠塔》的各种不同的看法,5月30日,又听了苏州市评弹团薛小飞、邵小华对该书的演出。当日,在给苏州市委宣传部长凡一的信中陈云讲到了他对于该书场场客满的感想,该书的“书情和说表,不见得比其他弹词好,但就有这么多人去听,值得我们注意一番”。^{[2][P23]}11月上旬,陈云在南京又观看了尤惠秋、朱雪吟演唱的《珍珠塔》选回。在经过反复的观看以及调查研究基础上,12月7日,陈云在上海同李太成、吴宗锡、何占春、周良谈话,讨论《珍珠塔》的整理问题,再一次提出了整理意见,“在整理时,或者原封不动,或者斩头去尾,或者全部否定,都是不好的。应该肯定一部分,否定一部分。”^{[2][P24]}对于修改中碰到的问题,陈云认为“大家动手,各人唱各人的《珍珠塔》,百家争鸣,要边改边演。”1961年1月底,陈云听完了朱雪玲、卞迎芳整改过的26回《珍珠塔》,同时为该书修改的辩论问题他又同周扬谈过两次。2月12日,陈写信给吴宗锡谈对整改过的《珍珠塔》的感想,首先他肯定了整改工作的必要,“不管怎样,这种尝试的精神是必须鼓励的,不管整改的经验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因为我们用几种方案来试试整改《珍珠塔》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多用几个方案进行试改,才能便于我们最后地判断对这种传统弹词应大改还是小改,那种改法好?”^{[2][P26]}

《珍珠塔》整改过程中对于人物的定位尤其对方卿的定位是关键,部分整理者竟把方卿处理成投奔李闯王参加革命行列的人民英雄。7月18日,陈云同苏州市委书记王人三和周良等谈话,肯定了大家认真修改《珍珠塔》的精神,同时提出“方卿不能代表农民,不要希望他革命。因为社会上有势力,所以才有《珍珠塔》”^{[2][P33]}。另外,陈云认为“方卿不中状元而能羞姑,觉得勉强。很难设想一个落难的书生,到陈府去寻母,以后竟发展到假装中状元来羞辱姑母。把陈廉改为反面人物,假道学,想赖婚,但赖婚这件事,在陈廉口中(对方卿、方母)始终未表面化,表里不一,不痛不痒”。^{[2][P71]}在陈云的关怀下评弹界成立了专门的整理小组,采取联席会议(上海与苏州)、分头实验的工作方法整理该书。由于吸收了陈云诸多宝贵意见才“使得《珍珠塔》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大有提高”^[15]。

不仅是对传统书目的整理,发展新书目也是出书的重要方面。一直以来陈云坚持鼓励发展新书目,1959年11月13日,陈云在杭州同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李碧岩等谈话时认为“传统书不少是好的,但要搞新的。假如老的七分好,新的只有三分好,我们鼓掌倒是要先鼓这三分好的,让它经过反复锤炼变得更好”。^{[2][P17]}陈云始终要求评弹界对待新书持包容态度,“新书开始时粗糙一些是难免的,好比拉面条就是由粗到细……要扶植新书,对创作新书的人,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2][P19]}。由小说而改变为新书是发展书目的捷径,从1960年代初期开始陈云十分关注《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长篇新书的编说工作。为了提高这两部书的质量,陈云经常与评弹演员、书目创作人员以及主管干部进行探讨、交换意见,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提高质量,他甚至亲自向编说这两部书的人员讲解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长篇

评话《林海雪原》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因为是新书所以说起来难度较大,陈云要求评弹演员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新书,即要熟悉书中所讲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他甚至讲“说《林海雪原》,应该知道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地形如何,敌我形势如何,座山雕是什么样的人。这样才能说的清楚。”^{[2] (P27)}

长篇弹词《青春之歌》是评弹演员赵开生、石文磊根据杨沫同名小说改编,后来由赵、石二人双档演出。该书(弹词版)第二回和第三回中都提到杨庄小学校长想把林道静献给县长的目的是为了为了使县长帮忙让自己去当警察厅长。1960年6月,在听了《青春之歌》的录音之后,陈云写信给吴宗锡,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这种表述不符合情理,“厅长是省政府一级的官职,县一级官职只能是警察局长。一个小学校长由县长帮助一下升任省的警察厅长,情理上说是很难的,恐怕改为警察局长的为好。”^{[2] (P64)}第四回中林道静因为宣传抗日被辞退杨庄小学教员职务时,石文磊提出“蒋介石不是打电报给施肇基向‘国会’提出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问题吗”。陈云当时即指出事实上不是向“国会”提出,而是向“国际联盟”提出。^{[2] (P64)}虽然就该书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意见与建议但是他对该书还是主要持肯定意见的,“应该说总的说来这十三回书是好的,初说有这样成绩是很好的。继续改进必有更好成绩。”^{[2] (P65)}

19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以及文革以后,陈云关于评弹书目整旧与创新的很多意见对评弹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即使在文化界的领导人中,也极少有像陈云同志那样,对一门艺术,作如此全面深入的研究,发表如此系统精辟的指导性意见的。”^[16]正是由于陈云的关爱与推动才使得评弹艺术虽经历各种坎坷但能够始终维系与发展。陈云对评弹事业的关心不仅是出于个人爱好,更是为了保存和发展这门传统艺术,这是评弹界的一大幸事。^{[17] (P248)}

三、陈云与评弹艺术的改革

陈云与评弹艺术的关系不仅体现在他与评弹艺人的关系以及其对评弹书目的关注上,“文革”以后陈云又亲自指导了评弹艺术的改革。动乱年代评弹的大改革并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该艺术的正确道路,“文革”以后陈云提出评弹发展要走正路,走正路就是要在书目和表演上既讲娱乐性又讲思想性,不搞低级趣味和歪门邪道,既不能离开正书也不能说野书。

“文革”开始后评弹艺术被指为靡靡之音而受到较大的摧残,所有的传统书目都不能唱了即使唱新的作品也不能用传统的曲调。“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部书目,无论是传统书目,新创作、新改编的书目,无一幸免于‘批判’。都成了封资修的‘黑货’被禁锢了。评弹成了‘顽固堡垒’,遗老遗少的玩物。”^{[18] (P226)}大量的评弹艺人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头衔而遭到批判,上海评弹团陷入了一片“红色恐怖”之中。^{[19] (P100)}在“左”的政策影响下评弹被引向学习“样板戏”的邪路,因此逐渐失去了其独特的艺术特色,评弹不再像评弹。“大改革”时,评弹成了“评歌”、“评戏”,起杨子荣角色,演员需要穿皮袄上台,甚至有演员还要在台上翻跟头、豁虎跳。

“文革”中陈云非常牵挂评弹艺术的发展,“担心评弹不知搞得怎样了”,后来他跟评弹演员余红仙讲,“‘文革’开始后,我没有听到评弹,不能再听评弹,心里是很牵挂。突然有一次广播喇叭里响起《蝶恋花》,我心里很激动,刚刚听得两句,没了,我真是说不出的味道”^{[19] (P111)}。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很快就与评弹界恢复了联系,1977年6月1日、2日,他在杭州大华饭店观看浙江省曲艺团演出的中篇弹词《李双双》,演出结束后同演员座谈,在座谈中陈云讲到他对评弹艺术改革的具体意见。

首先是对乐器的改革,“文革”中为了摆脱“靡靡之音”的嫌疑,演员弹唱时很多都用比较高亢的音调同时琵琶都改用钢丝弦。陈云认为用钢丝弦音太响、太刺耳,一味的唱高调,可能会损害到演员的喉咙,不利于延长演员们的演出年限。因此他建议,“演唱音调的高低,演员要根据自己的喉咙,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要一味地、一个劲的提高调门”^{[2] (P116)}。其次是对于评弹“唱”与“说”的协调,评弹的艺术特色是以说表为主,文革期间评弹表演的成分增多了,观众由过去的听书转变为不但要听,还要看,这就增加了观众的负担,使“听众很吃力”。因此,陈云认为“评弹不等于话剧”,评弹演的成分有发展,使角色形象化是必要的,但不要多,多了不行。再次是对评弹噱头的把握,噱头在评弹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能调节气氛给听众带来欢乐。说传统书的少数艺人大放、乱放黄色下流噱头,迎合庸俗趣味,使有的地方书坛上一度乌烟瘴气,影响恶劣。因此,对于该不该保留噱头,引起了评弹圈里的争论。陈云认为去掉了噱头会破坏评弹艺术的完整性,“说书总得说得风趣些,评弹要有噱头,但也不应该过多”。^{[2] (P116)}

上海评弹团在学习陈云关于噱头的意见时认为“噱在评弹书目里确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没有噱头的书是不好听的。但是噱头要放得恰如其分,放得趣味健康。”^{[20] (P32)} 另外,陈云对于评弹演员的服装也提出了较为中肯的建议,当其见到演员汪雄飞穿了中山装,天气热,出汗多时说:下次不要穿中山装,穿衬衫就行了,说书又不是唱戏,非要穿行头不可。^{[2] (P116)} 紧接着陈云在杭州又主持召开了评弹座谈会,并亲自起草了《对当前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会议期间他还做了多次重要讲话,号召评弹工作者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市场的大潮下评弹的发展遇到了新的问题,新书不如传统书受欢迎,戏剧、电影以及其他曲艺都有发展,这就导致评弹以说新书为主遇到困难,上座率很低。对于评弹上座率低的问题,陈云建议从社会上找原因。鉴于十年动乱中评弹艺术中断数年失去了一代听众,陈云认为要关心青年人的文化生活,要关心下一代人的成长,“不要让青年就评弹,而要让评弹就青年。就青年,不停顿于迁就,要逐步提高他们。在就青年中去锻炼,出人才,出艺术”^{[2] (P125)}

面对市场日趋式微的形式,评弹要振兴就要进行改革,只有遵照陈云提出的出人、出书、走正路才是改革的正确方向。要出人必须先出书,出人和出书是密切相关的,要出新人、出好书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在不断的艺术改革中出人、出书、走正路,又在出人、出书、走正路中促进传统艺术的改革和发展。出人、出书、走正路是陈云对评弹的严肃要求,也是对评弹艺术的深情关注和热切企盼。陈云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评弹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整个文艺工作都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21] (P198)} 只要认真地按照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要求去做,我们的曲艺、文艺就一定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群众的需要,不断发展,日益繁荣。^[22]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在陈云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05-06-14.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 陈云与评弹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陈云传[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 [4] 孙东升. 陈云与评弹艺术研究述评[A]. 陈云研究述评(下)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 [5] 何其亮. 个体与集体之间: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评弹事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6] 颜仁翰. 一次难忘的接见[A]. 评弹艺术(第 11 集) [M]. 北京: 中国曲艺出版社, 1990.
- [7] 金 坡 等. 情定西厢 艺术长生: 忆弹词名家杨振雄[J]. 史林, 2013 (口述增刊).
- [8] 何占春. 缅怀评弹艺术的伟大知音[A]. 评弹艺术(第 18 集) [M]. 北京: 中国曲艺出版社, 1996.
- [9] 杨振雄 等. 关于陈云同志和评弹的几件事[A]. 评弹艺术(第 21 集) [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7.
- [10]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编辑小组.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 [11] 吴宗锡. 评弹小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 [12] 周 良. 试论弹词《珍珠塔》[A]. 评弹艺术(第 3 集) [M]. 北京: 中国曲艺出版社, 1984.
- [13] 左 絃. 在反势力的外罩下宣扬封建[A]. 评弹艺术(第 4 集) [M]. 北京: 中国曲艺出版社, 1985.
- [14] 赵开生. 对《珍珠塔》的改革谈我的认识过程[A]. 评弹艺术(第 7 集) [M]. 北京: 中国曲艺出版社, 1987.
- [15] 曹汉昌. 关怀与鞭策[J]. 曲艺, 1995 (6).
- [16] 吴宗锡. 评弹知音陈云[J]. 上海滩, 1994 (7).
- [17] 姚荫梅. 陈云同志听我说书[A]. 陈云同志和评弹艺术[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4.
- [18] 周 良. 苏州评弹的历史[J]. 评弹艺术(第 4 集) [M]. 北京: 中国曲艺出版社, 1985.
- [19] 周锡山. 余红仙——余音绕梁红仙歌[M].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1.
- [20] 文 子. 加强社会责任感: 上海评弹团部分演员学习讨论陈云同志意见[A]. 评弹艺术(第 2 集) [M]. 北京: 中国曲艺出版社, 1983.
- [21] 周 良. 陈云和评弹界交往实录[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 [22] 罗 扬. 出人、出书、走正路——学习陈云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J]. 曲艺, 1991 (5).

(责任编辑: 吴 贇)